

读书札记

辛亥革命与“首义文化”

——读罗时汉《城市英雄》

文\本刊特约撰稿 章开沅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理应受到尊敬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自动地肩负起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人去国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的家庭幸福生活,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思想、感情乃至整个生命都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生在中国是否幸福? 据此山河绝好之大舞台,是奋发有为还是蹉跎岁月? 这些提问仿佛狮子吼,不仅在当年有力地叩击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心弦,就是现今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难道不也应该以此扪心自问吗?

作家罗时汉《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为我们打开辛亥革命宏大的历史画面和精彩细节。也为这些问题提供自己的解答。

人所共知,无论古今中外,新社会的诞生和旧社会的灭亡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残酷的较量。这是由于旧社会虽然腐朽,然而毕竟早已形成一个完备的国家机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占有

绝对优势;而新社会则有一个从幼弱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同时也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摸索前进道路,然后才有可能最终取代旧社会。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当年的辛亥志士通过一场并非彻底的革命,就能建成一个完美的长治久安的民主共和国。历史表明,他们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们的无可磨灭的勋绩乃是为这个历经百年的巨大、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改造工程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仅仅是走完第一步,他们也只能走完第一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代替后人去走完第二步乃至第三步。

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无愧为新世纪创造历史的英雄,他们和人民群众一起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其历史意义不仅

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后世的人们把孙中山称作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领袖人物;把辛亥革命称作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发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鄙薄自己的先辈,更没有理由讥笑他们的幼稚与失败,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走着他们没有走完的路,何况我们的征途中也不断出现着失误与挫折。正如一个犹太学者亚伯拉罕·赫切尔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记忆永存的民族,一个忘记过去就无法认知现在的民族。”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早就说过:“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给?”他把历史称为“今日切要之学”,并且努力从历史遗产中寻求激发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

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胜利,乃是三股潮流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革命潮流,一是立宪潮流,一是群众自发抗争潮流。革命潮流自然是历史的主要潮流,但风起云涌的下层群众的自发抗争,以及其引发的社会大动荡,毕竟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原始破坏力。也正因为有见于此,革命党人才把自己定位为:“实下等社会之的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而自己的职责则是:“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羽翼下等社会”。

“首义文化”是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地域历史文化即荆楚文化的延伸和传承。追溯荆楚文化的特质,有人用五句古语来概括,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惟楚有才,深固难徙”。正是这些文化基因熔铸了武昌首义志士的人格,从而创造了划时代的壮举。“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个词语最早见于老子的《道德经》,但用于群体之说源自武昌首义的志士,也符合荆楚历史文化的精神,可以界定为辛亥革命的特色,它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就是要敢于创新、抢抓机遇。罗时汉《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所展示的“首义文化”将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它不仅属于湖北武汉,而且也应成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珍视的遗产和财富。

新书推介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卓兰花

《弟子规》到底说了什么

近日,中华书局出版了宁夏作家郭文斌的新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引起读书界关注。郭文斌祖籍甘肃,著有畅销书《寻找安详》等。长篇小说《农历》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短篇《冬至》获“北京文学奖”;散文《永远的堡子》获“冰心散文奖”。现任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日前,郭文斌应海南省作协之邀前来海南讲学,海南日报记者就《〈弟子规〉到底说什么》采访了郭文斌。

《海南周刊》:当下有关《弟子规》的书已经非常多,您为什么还要出这本书?

郭文斌:中华书局出版社在做了市场调研之后,发现市场上有关《弟子规》的书,大多是直译型、知识型的,还没有一本究其精神实质作深入探讨,特别是从实践层面服务当下生活的书,他们知道近些年我在学用《弟子规》,并以其为例学讲安详,就动员我写了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给我出的第一本书《寻找安详》卖得很好,半年内就重印三次,而《弟子规》和安详本身又相得益彰。

《海南周刊》:在诸多训蒙养正读本中,您为什么独对《弟子规》情有独钟,花这么大的功夫去推广它呢?

郭文斌:《弟子规》和安详能够互相印证,并且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单就我的儿子来讲,他曾经非常焦虑,而且叛逆,但自从接触《弟子规》后,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有点“入则孝,出则悌”的味道了,现在回家能够给爷爷奶奶洗脚,主动承担家务,生活用度非常节俭,而且乐于助人。他曾经和同学关系很紧张,现在能够和睦相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从一个怨气冲天、愁眉苦脸的人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海南周刊》:您差不多用一半的篇幅讲实践《弟子规》的六个原则,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您为何一再强调“落地”的原因?

郭文斌:一个理论,如果我们不去实践,它永远只是一个理论,和我们的生命没



郭文斌近照

有任何关系。《弟子规》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方,但只有在我们依此用药之后,才会产生作用,否则,它只是一个药方而已。因此,面对那些对《弟子规》说三道四的人,我会先问他们一句,您实践过吗? 如果没有实践过,那就没有发言权。

一粒种子,只有落地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否则,它永远是一粒种子;一个面包,只有我们食用它,才能变成我们的能量,否则它跟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这事实上就是知和行的关系。因此,我在拙著中讲,《弟子规》是供我们“行”的,不是供我们“学”的。因此,《弟子规》讲,“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确实如此。

《海南周刊》:《弟子规》只是清代一个秀才写的用于教育儿童的训蒙读本,属于传统伦理规范范畴,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我们还需要毫无保留地完全继承并遵守吗?

郭文斌: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效,前面讲过,我的家庭就从中受益,我的儿子就从中受益,还有周边的很多人,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的效用,因为它本质上讲的是“根本快乐”的规律性智慧。

《弟子规》所讲的,就是让我们善待呼吸,善待心跳,让它保持到一个妥善的状态,和谐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安详的姿态,因为它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凡是现代的就是先进的,那么,请问,近现代社会,有谁发明了一种文字,超过了汉字? 有谁写出了一部哲学著作,超过了《道德经》? 有谁写出了一部心灵学著作,超过了《六祖坛经》?

《海南周刊》:如果按照《弟子规》去做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能否立足?

郭文斌: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按照《弟子规》去做人,他肯定是一个受社会欢迎的人。真正的竞争力是爱,而《弟子规》正是成全人的爱力的。如果我们承认没有哪个人会拒绝母亲,我们就会承认没有哪个人能够拒绝爱。既然没有谁可以拒绝爱,那么,拥有爱力的人怎么会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呢? 我有一个朋友,当初想方设法赚钱,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后来他跟我一起学用传统,不到两年,一位老板就把一层楼给他,让他成立一个文化公司。因为他用传统思维解决了老板用经济思维无法解决的烦恼。

《海南周刊》:您在长篇小说《农历》中,大量引用了《弟子规》等蒙学经典,也引来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

郭文斌: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和作家,我何尝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但最后我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因为在我心目中,好作品首先要具备能够让读者醒来的品质,就像一位母亲为了把孩子唤醒顾不上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符合韵律一样。在银川,有一位名叫楚文的热心人,一次买了两千册给陕甘青的学生义捐,就是看到了《农历》是一本生活化的《弟子规》,方便孩子们直接参照做人。

《弟子规》到底说了什么 封面



《城市英雄》封面

